

• 哲学通俗读物 •

漫谈群众和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

曹 开 宾

-49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哲学通俗读物 ·

漫谈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曹 开 宾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漫谈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哲学通俗读物

曹开宾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莆田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125印张 45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0

书号：2173·29 定价：0.22元

前 言

如何正确认识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已作了科学的回答。但是，我们今天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滋长了个人崇拜的现象，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用了极大的努力进行拨乱反正工作，重新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了个人崇拜现象，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但个人崇拜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要彻底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还要继续努力。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纠正在批判个人崇拜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即有些人忽视甚至抹煞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怀疑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

与个人崇拜现象有联系，由于长期以来突出个人，贬低群众，有些人的群众观点淡薄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有所削弱。

这些情况说明，现在很有必要大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说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牢固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个人崇拜，密切群众和领袖的关系，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促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这些就是我们写这本小册子的主要考虑。

由于作者学识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如能得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教，那将是对作者的一个极大的鼓励。

目 录

前言

- 一 “历史是人民写的” (1)
- 二 时代的英雄 (16)
- 三 人民的儿子 (26)
- 四 反对个人崇拜 (34)
- 五 群众的事业 (48)

一 “历史是人民写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许多哲人智士对各种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过可贵的探索，提出过各种主张和学说，但是都没有找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才真正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列宁全集》第2卷，第443页）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1页）这段话深刻地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不过，要真正认识这个道理，并不十分容易，因为社会现象纷繁复杂，而历来的统治者和唯心主义者、历史学者，以及旧唯物主义者，又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在他们看来，历史是英雄伟人随心所欲创造的。好象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就会使历史陷入迷途五百年，而另一个英雄又可以使历史转入另一条轨道，就象司机转一下方向

盘就可以改变汽车前进的方向。比如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就认为，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他还举出极其荒谬的例子说：“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版，第174页）

又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历史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即“批判和批判者”创造的，而群众则是“没有灵魂”的“惰性物质”，是“精神的真正敌人”。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观点。“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一幅名画的题目，画的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一群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神圣家族”作为他们这部论战性著作的书名，其用意就是讥讽鲍威尔一伙以救世主自居的丑态。“英雄论”说到底是主张意识、上帝创造历史。再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轻蔑地称群众是“群氓”，说他们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他们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英雄与群氓》。民粹派把群众比做零，把英雄人物比做实数。在数学上，在实数“一”的后面加上三个零是一千，加上四个零是一万，等等。如果零的前面没有实数，多少个零加在一起还是个零。在民粹派看来，如果没有“英雄人物”，不管有多少群众加在一起，也还是等于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起什么作用。当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后来列宁又对民粹派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粉碎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和主观社会学。

这种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否认群众的伟大力量的

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通常有唯意志论和宿命论两种表现形式。

在唯意志论看来，历史是由少数“英雄豪杰”、“天才人物”的意志决定的。如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就说过，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636页）又如十九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大肆贩卖“超人”的反动哲学，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集古今中外唯心史观之大成，鼓吹什么“天才论”。他们露骨地吹嘘自己是“天才的灵童”、“江上的奇峰”、“党的化身”，而把广大人民群众污蔑为只知油盐酱醋茶、妻子儿女、恭喜发财、“连鱼目和珍珠也分不清”的群氓，是“象算盘珠一样，拨一拨，动一动”的阿斗。可见，唯意志论是英雄史观的一个表现形式。

在宿命论看来，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如“上帝”、“天命”等。我国古代的孔子就有这种观点。他宣扬“天命论”，鼓吹“上智下愚”。他把奴隶主贵族的头子说成是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是受“天命”来统治劳动人民的；而劳动人民则是“困而不学”的“下等人”，是注定被统治的。孔子天命观中的天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能发号施令，实行赏罚。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如年岁的丰歉，战争的胜败，都是由“天”的意志决定的。比如说，有一次孔子受到匡人的围困，生命危急，他慨叹说：“文王既没，文不在

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文化不是都由我继承了吗？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我就不该作这种文化的继承人；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又有一次，宋国大夫桓魋要杀孔子，孔子化装逃走。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他的意思是说，天赋予以盛德，桓魋能把我怎么样！这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实际上还是主张伟大人物创造历史，所不同的，是这种伟大人物是秉承“神”的意志行事的。

可是，远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历史的发展提出过一些合理的看法。比如，春秋时期，有些人提出重“民”的观点。他们认为，“神”和“民”同样重要，而且“神”是依赖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的，如果没有人民所进行的劳动生产，国君就得不到鬼神的保佑。有个叫季梁的人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又如《管子·牧民》篇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作者认为，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生产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虽然，从这些例子不可能引伸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但是，可以看出我们有些古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

重视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也有所反映。他们反对神权，反对中世纪把人贬低为由上帝摆布的可怜虫，热情歌颂“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如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就曾以这样的诗句写

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呀！人的理性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仪态和举止多么恰到好处，令人叹惊！人的活动多么象一个天使！人的洞察力多么宛若神明！人是世界的美！动物中完善的典型！”（《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当然，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这种歌颂，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是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大造舆论，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不过，这种进步的思想，对反对封建神权统治有积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早在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斗号角——《国际歌》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无产阶级不需要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最生动的概括。

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这样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吃饭、穿衣、居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则靠生产。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人民群众的历史。

人民群众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生产经验，改善劳动工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法

律制度和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以英国的产业革命来说，它不仅是一场巨大的技术变革，同时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基本完成，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器。产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初，每年输入英国加工的棉花，不超过二百万磅，一七八九年就增至三千二百四十万磅；生铁产量在一七四〇年没有超过一万七千吨，一八三四年升至七十万吨。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进一步摧毁了封建制度和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地确立起来了。同时，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又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这个例子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社会的发展，说明归根到底，人民群众生产物质资料的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也有重要作用。这个说法，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被视为“奇谈怪论”的。那时，“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就是“罪恶”，知识愈多愈“反动”，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愈无知愈好，交白卷是大英雄，简直闹到可笑的地步！记得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它拥有的科技力量和科技队伍，是这个民族的生产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举个例

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西德、日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比较高的文化和比较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反，某些大量出口石油的国家，手中有许多钱，但经济建设的速度却不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力量不足。

对于什么叫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这样指出过：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知识形态的生产是社会必要的生产。这些部门的工作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它们和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一样，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同样也创造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知识分子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中的作用。

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从事体力劳动的被压迫阶级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力军。但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脑力劳动，因为与物质生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创造物质财富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如封建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农民种植作物和饲养禽畜的经验分不开的。以元代农学家王桢来说吧，他深入下层，接触劳动人民，注意农事，仔细观察，积累农业知识，终于写成了《农书》这样一部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科学著作，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一般的科学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使得从事脑力劳动的一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生产管理人员从体力劳动者中间分离出来，但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这种分离过程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生产劳动者的性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4页）大家知道，自然科学是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因此把它运用于生产过程，凝结在生产的各个要素上（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管理等），就会变成直接的生产力。而承担发明、创造和运用自然科学这种社会职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然是生产力的要素，是生产劳动者。

我们党历来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里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特别重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事实说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例如，以上海宝钢引水工程来说，原来确定由淀山湖引水，并已于一九七九年动工兴建，已埋管十六公里，后来上海科技工作者对这项工程提出建议，认为宝钢建立在长江边，应该引用长江水，只要解决

长江枯水期含氯离子高的问题，从长江引水是可行的。经过腐蚀、环保、水利、土木、建筑、净水、金属等学科的专家们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确认从长江引水在经济上、水量上都比从淀山湖引水好，水质也符合宝钢的要求。最后有关方面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改为从长江筑库引水，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基建投资上千万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要充分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

（二）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首先，人民群众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为人们从事一切科学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前提。“民以食为天”。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个现实的世界，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生产劳动者提供的物质条件为其基础的。十年浩劫期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谁要是关心一下物质生活就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似乎革命者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四人帮”鼓吹禁欲主义不过是掩盖他们自己的穷奢极欲而已！马列主义哪一天反对过物质生活呢？很难想象，一个人十天半月不吃饭能活下去，更不要说去从事其他的活动了。今天，我们能安心地搞创作，搞科研，读书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文化、艺术等活动，不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前提吗？

其次，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唯一源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来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无不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例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许多伟大的文学艺

术作品都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也是作者直接依据人民群众所创作的素材并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提高而成的。俄国伟大的作曲家格林卡曾经说过，人民创造音乐。世界文豪高尔基也告诉我们：“如果不知道人民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真正的历史，而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断地和决定地影响到最伟大的书本文学作品的创造的。”就以我国古典名著《水浒》来说，它的源泉就是来自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中的各色英雄，以及《水浒》出现以前在人民群众中所流传的宋江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还不断进行加工提高。如果没有这些源泉，光凭作者施耐庵个人的想象力，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来的。再如，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许多作品来说，其源泉也来自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聂耳在创作《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和《新女性》等歌曲时，曾经冒着炎夏烈日，或踏着晨霜夜露，到筑路工地、船泊码头、纺织工厂，体验劳动者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些后来都被吸收和溶化到他的作品里去了。古今中外的艺术史都证明：只有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一个作家和作曲家，要是一旦脱离了人民，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样说是不是知识分子在创造社会的精神财富中不起作用了呢？当然不是。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作用就在于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实践经验作了概括和总结。如华佗是一个为我国人民所尊崇、怀念的医学家，他在医学上所以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除了他的刻苦钻研，虚心学习

以外，同时也由于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宝贵经验，并加以提高，再应用于医疗实践。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并且向老百姓请教，他把所获得的丰富知识加以总结和提高，并因病人的特殊情况而决定医治方法和用药的分量，所以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效果。相传有一个樵夫在深山里迷了路，肚子很饿，看见有个隐士在采黄芝吃，他也采了几枚，吃了很耐饿。樵夫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华佗，华佗就上山去采集，经过实践证明黄芝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华佗就用黄芝来配入药方，作为强壮剂。这说明华佗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

另外，在历史上，人民群众还直接参加了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活动，劳动人民当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杰出人才。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就在建筑、木工、器械等方面有所创造，对当时建筑和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里，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哩！据说，鲁班的妻子，看到丈夫终日在风雨中奔波，心里很不安。她精心设计、制作出了能巧妙地打开和折合的雨伞。从此，鲁班随身携带，随时用来遮风挡雨。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鲁班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隋代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直到现在还完整坚固。这座桥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隋唐时代，用木板雕刻文字以之进行印刷的雕板印刷就已问世。但雕板印刷还存在费工、耗料等缺点。宋代的“布衣”（劳动者）毕昇决心对此加以改革。经过长期的实践，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毕昇的这一发明，奠定了现代铅印技术的基本原理。四百年后，一个德国人才照此原理